

|| 专 题 史 系 丛 书 ||



中国典籍史

李致忠 周少川 张木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专 题 史 系 列 丛 书 ||

中国典籍史

李致忠 周少川 张木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典籍史/李致忠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专题史系列丛书)

ISBN 7-208-05310-3

I. 中… II. 李… III. 古籍—图书史—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6897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专题史系列丛书·

中国典籍史

李致忠 周少川 张本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6 字数 373,00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5310-3/K·1065

定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专题史著作是专门性强而主题面广的一类学术研究专著。这类著作,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某一专题为研究对象,在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见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钩沉稽玄、探幽发微、考镜源流、传承文明,力求翔实而又清晰地展现这些领域滥觞、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加深“通史”和“断代史”等对相关领域的阐述方面,起着其他论著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致力于专题史著作的出版。自 20 世纪 50 年代迄今,先后出版了长期从事专题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撰著的《中国货币史》、《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印刷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华文化史》、《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杂技史》、《中国小学史》等一大批专题著作,受到海内外学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

为了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决定组织出版“专题史系列丛书”,并从历年已出版的数百种专题史著作中遴选出一批学术价值较高、出版时间较长的图书,汇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分批出版,以飨读者。

本丛书出版前,在编辑工作中,或由作者对原书作了必要的校订,或由编者对原书插图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特予以说明。

作者简介

李致忠 1938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任国家图书馆业务处处长、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研究分会主任委员。著有《古书版本学概论》、《历代刻书考述》、《宋版书叙录》等。发表论文150余篇。

周少川 1954年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著有《古籍目录学》、《汉书选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点校)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张木早 1962年生。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著有《文献与文献收集》等。发表论文多篇。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7
第一节 典籍的概念	7
一、典籍的构成	8
二、典籍的本质	11
第二节 典籍的产生	13
一、早期典籍的产生	14
二、正式典籍的产生	16
第二章 百家争鸣与典籍初兴	21
第一节 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21
第二节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24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30
第三章 学术文化发展与典籍迭兴	34
第一节 独尊儒术与经学典籍	34
一、经学的确立与经学典籍的发展	35
二、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39
三、经学的解经典籍	47

第二节 佛教传播与佛教典籍	51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流行	52
二、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59
三、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刊行	64
第三节 道教方术与道教典籍	70
一、道教的流传及其典籍的累积	70
二、《道藏经》等道教丛书的编纂	77
三、道教典籍的分类和内容	81
第四节 史学传统与史学典籍	85
一、以时为纲:编年体史籍首开风气	88
二、以人为纲:纪传体史籍的“正史”地位	92
三、以事为纲:纪事本末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98
四、各具功能:其他体裁的史学典籍	102
第五节 文学传统与文学典籍	105
一、诗歌的创作及其典籍	106
二、散文的创作及其典籍	112
三、戏剧的创作及其典籍	115
四、小说的创作及其典籍	119
五、诗文评论及其典籍	124
六、文学典籍中的诗文总集与别集	126
第六节 兵法传统与兵家典籍	128
一、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129
二、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133
三、古代兵法的创新与兵书的繁荣	138
第七节 科学传统与科技典籍	143
一、古代科技的产生与科技典籍的出现	143
二、古代科技发展期的科技典籍	146

三、古代科技延伸期的科技典籍·····	151
四、西学东渐与科技典籍的变化·····	155
第八节 小学传统与文字、音韵、训诂典籍·····	160
一、小学创立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1
二、小学发展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6
三、小学鼎盛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72
第九节 类书传统与类书典籍·····	177
一、类书典籍的起源·····	177
二、类书典籍的发展·····	179
三、类书的种类和利用·····	189
第十节 丛书传统与丛书典籍·····	191
一、丛书的起源及其种类·····	192
二、丛书典籍的发展·····	196
 第四章 典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209
第一节 典籍的生产材料·····	209
一、纸书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材料·····	209
二、纸书的出现和流行·····	219
第二节 典籍的生产方法·····	224
一、印制书籍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方法·····	225
二、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28
三、活字排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32
四、套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45
 第五章 典籍的装帧艺术·····	251
第一节 典籍的版面设计·····	251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版画·····	256

第三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	266
一、简策·····	266
二、帛书卷子装·····	268
三、纸书卷轴装·····	269
四、经折装·····	272
五、梵夹装·····	274
六、旋风装·····	277
七、蝴蝶装·····	280
八、包背装·····	281
九、线装·····	283
十、毛装·····	285
第六章 历代典籍的收藏·····	288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公家收藏·····	288
一、典籍公家收藏的起源·····	288
二、历代公藏典籍的收集·····	291
三、历代公家藏书处所及管理机构·····	300
四、公藏典籍的利用·····	319
第二节 典籍的书院和寺观收藏·····	324
一、典籍的书院收藏·····	324
二、典籍的寺观收藏·····	332
第三节 典籍的私家收藏·····	339
一、典籍私家收藏的起源·····	339
二、私人收藏典籍的原因·····	340
三、历代著名的典籍收藏家·····	346
第七章 历代典籍的整理、编目和分类·····	369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整理·····	369
第二节 历代典籍的目录编制·····	399
第三节 典籍分类的发展与演变·····	427
 第八章 典籍的流散·····	 445
第一节 典籍的政治劫难·····	445
第二节 典籍的战争劫难·····	457
第三节 典籍的自然灾难·····	467
 参考文献·····	 473

绪 言

“典籍”一词最早盖出于《孟子》。《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曰：“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可见那时典籍的概念还泛指文献，未必指书册典籍。《尚书伪孔序》则谓：“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后汉书·崔寔传》谓：“少沈静，好典籍。”可见汉朝人关于典籍的概念便是泛指典册书籍、载籍。

中国典籍起于何时，实难详考。《尚书伪孔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其意是说早在伏羲时就已懂得以文字记事，以代结绳之政了。伪孔还进一步论列“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意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其意盖欲说明早在三皇五帝时，中国就已产生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类的典籍。但这毕竟是传说，谁也没有见过，难以置信。伪孔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又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原来是传说中的《坟》、《典》、《索》、《丘》等书，经孔子删繁就简、弘扬罢黜而失传了。这些话虽也难以置信，但孔子确实整理了古籍

而成六艺,用以课授生徒。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确实产生了典籍。但这些典籍乃长期蓄积而成,内容重复,文辞烦浮,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且未成体系。孔子则以教育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欲广泛行教,宣传古道,“举其弘纲,撮其机要”,因而不得不整理那些已有的典籍以成新籍——《易》、《书》、《诗》、《礼》、《乐》、《春秋》。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典籍的起源似可这样概括:生于孔子前,成于孔子后;兴于孔子前,盛于孔子后。

进入战国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极不成熟,尚未定型。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各抒己见,各申主张,各扬观点,各献治国之策。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伴随“百家争鸣”而来的,是产生了大批的私人著作,使我国的典籍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典籍生产的高潮。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此后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灭佛、元人毁道、清廷禁书,以及兵燹回禄之灾,典籍曾屡遭厄运,但自两汉以来,中经盛唐、两宋,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特别是在纸张广泛应用、印刷术通行以后,中国典籍旧有新传,代有新作,多如丘山,浩如烟海,将中华民

族的睿智思维物化了出来,凝结成为灿烂的华夏文化。

真正的典籍,是学术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学术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是产生大批的典籍。中国的学术起源较早,并且一脉相承,赓续不断。先秦就已萌生的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农桑种植以及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学,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中,不但赓续发展,有的还不断拓宽和深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降,则经学独占学坛两千年,直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愈发展愈辉煌。史学自司马迁创纪传体《史记》以降,则中国正史始终沿着此路发展。虽然此前有编年体、此后有记事本末体等大量史书问世,但终未列为正史。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土,佛学渐染,非但大量佛典被传译,中土著述亦不断丰富佛藏。道教自东汉崛起,渐与先秦道家相结合,成为中土自生自长的宗教。其教义学术,亦千年不衰,递相发展。至于文学,无论诗歌文赋、词曲小令、戏剧小说,都各自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必须放眼这些学术发展的大背景,并努力到这种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索典籍的源流派脉,才能理清典籍发生、发展的轨迹。

典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凡是典籍,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科学技术,都是人们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们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影响;受时代的局限;受阶级、阶层及个人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的制约;受社会风尚、地域习俗的浸染。所有这些,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折射到典籍中,就使典籍带上了时代特色、阶级特色、地域特色和个人特色,因而也就使典籍具备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形态,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影响着旁人与后人。

人的意识传播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

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而当着人们的某种意识物化成一种独立的形态时,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因为典籍无非是人的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逻辑有序的载体而已。典籍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制等。几千年来,中国典籍的制作材料,用过龟版兽骨,用过玉石铭器,用过版牍竹简,用过缣帛。待到纸张出现并广泛应用,则是典籍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典籍生产的一次解放。

由于典籍生产材料的不同,典籍生产方法也有很大区别。用龟版兽骨、金石等材料,其制作方法只能用刀刻或浇铸;用竹简缣帛,其制作方法只能用笔写,而绝不可能用来印刷。当纸张用作典籍制作材料之后,则不但可以笔写,同时也给印刷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印刷术产生并广泛行用之后,则典籍发展史上又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典籍生产又一次解放。

典籍的装帧形制,取决于典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甲骨金石的书籍,难谈装帧艺术。而竹木简书便只能是编简成册,故称为简策。帛书可折可卷,故有帛书卷子之称。纸书可卷,故有卷轴装。卷子可折,故有经折装。印制典籍其叶可作各式装订,故又有蝴蝶、包背、线装等册叶装。探讨上述典籍的这些演变形式,显然是《典籍史》不可推卸的责任。

典籍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经过创作编撰,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因此,典籍的价值首先是能够供人查检和阅读。历来的知识分子,为了不断地获取知识、思想、经验和理论,就要不断地读书。而为了读书方便,就要不断积累和藏书。“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①。此为先秦人藏书的范例。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

^① 《庄子·天下篇》。

好写与之,留其真”,并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①。此为汉代藩王藏书的范例。唐京兆李泌受封邺侯,家富藏书。韩愈诗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②此为唐朝官员藏书的范例。此后,随着雕版印书的盛行,得书较易,藏书家更多。宋朝的王洙、晁公武、尤袤、陈振孙、贾似道,以及明朝的周藩、晋府、天一阁、汲古阁,清朝的也是园、传是楼、士礼居、拜经楼、抱经堂、爱日精庐、海源阁、八千卷楼、皕宋楼、铁琴铜剑楼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都以藏书而名家,构成了中国书文化的重要方面。而历代政府为表示自己的稽古右文,亦不断溥益册府,充实公藏。自汉代的兰台、石室,直至清朝的内阁大府、天禄琳琅,历朝都有皇家的藏书。而有藏书,必有整理、著录与编目。公藏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中秘而成《七略》首创公藏目录以降,直至满清,历代都有国家藏书目录问世。私藏自南朝任昉撰有私藏目录,中经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以降,直到清朝各大藏书家,亦无不编制藏书目录。而无论公藏、私藏,有书便录,以记一代藏书之盛的史志目录,则自《汉书·艺文志》开其端。此后有数部正史亦立此志。即或是有的正史未立此志,后人亦几乎全部补齐。而自《明史·艺文志》起,世间积书甚丰,已难以在正史艺文志中著录,故改为著录一代著述之盛。所以就中国历代产生的目录典籍而言,亦可说是浩如烟海。记录描述中华民族对典籍的收藏、整理、编目,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目录学和目录专著,显然也是《典籍史》所应涉及的内容。

本书是一部志书体例的专著。志者,记也。《周礼·春官》谓小史之职“掌邦国之志”。东汉郑玄注:“志谓记也。”故志书便被称为“记

① 《汉书·河间献王传》。

②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事之书”。本书试依中国文化学术传统而志典籍的迭兴,依中国典籍的物质构成而志典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和装帧艺术,依中国典籍的藏度而志典籍的整理、分类与编目,依中国典籍的厄运而志典籍的劫难、散佚。然而,“志书”毕竟是史书之一类。无论是“竖排横写”,还是“横排竖写”;不管是记事之始末,还是述事之迭兴,终究离不开历史发展的总绳,终究不能不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留下其滥觞、初兴、繁荣、嬗变的历史轨迹。就本书而论,第一至三章所述,乃文明初肇至东学西渐历史长河中以典籍迭兴而贯照的中国文化传统;第四、五、六、七、八章,虽分述典籍的制作、装帧、整理、分类、编目、劫难、散佚等,但无一不与每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军事、科学技术等相密切联系。故上海人民出版将本书收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并更名为《中国典籍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章 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炎黄子孙承继文化传统的重要依据。

第一节 典籍的概念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𠩺”（《殷契拾粹》四五〇）、“𠩺”（《殷契释编》七八四），会意造字，作双手或单手捧册之状。金文的“𠩺”（见“召伯虎敦”）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典”比较相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兀是放书几案，将册置于几案上或以手捧册，皆有尊奉之意。《尚书》中有《尧典》，记述了古代君王尧训示臣民的言论和治国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籍”字出现较晚，未见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的小篆作“籍”，曰：“籍，簿也，从竹藉声。”即簿册、书册之意。

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廛，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父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寔传》称崔寔“少沈静，好